

社会教育理念下的图书馆学思想

——马宗荣先生与近代图书馆事业

吴稼年

摘 要 马宗荣先生(1896-1944)是中国近代图书馆事业史上具有特色的学者。作为社会教育学家,他从自身专业角度审视图书馆,撰写了多部图书馆学著作,并担任大学图书馆馆长。他提出图书馆是自由利用的教育机关,其图书馆“体用论”思想也得到图书馆界的广泛关注。参考文献 14。

关键词 马宗荣 图书馆学史 社会教育 图书馆学者

分类号 G259.29

ABSTRACT Mr. Ma Zongrong(1896-1944) became a student in Japan in 1918. He studied social education in Japan, returned to China in 1930, and then became a library director and a library scholar. In this paper, the author analyzes Mr. Ma's thoughts in library science. 14 refs.

KEY WORDS Ma Zongrong. History of library science. Social education. Library scholar.

CLASS NUMBER G259.29

在中国近代图书馆事业史上,马宗荣先生是一位具有特色的人物。他并非学习图书馆专业,却撰写了“现代图书馆”系列著作。他在日本留学十一年有余,却极推崇欧美的图书馆事业,尤其是美国的图书馆事业。当他于1930年春回国参加社会工作之时,在中国图书馆界早已有了较大的名气。作为中国近代图书馆界的代表人物之一,他对图书馆精神的理解,在当时就处于较为先进的水平。

1 马宗荣先生简介

马宗荣先生出生于1896年,幼年好学。中学毕业后被聘为息烽县县立两级小学校长,对学校教育进行改革,并从此热爱教育工作,奠定了教学管理与实践的基础。民国七年(1918),他以第二名的优异成绩被公费录取为贵州省留日矿业学生^[1]。后因资助机构由贵州省改为教育部而换校,进入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改学社会教育专业。毕业后升入该大学社会学院研究所进一步攻读社会教育专业,受到吉田熊次等

教授的好评,被聘为岩波书店教育科学讲师^[2]。

马宗荣先生留日期间,专攻社会教育专业,据其本人介绍,“昔从事于教育界有年,继来留学日本,又系专攻教育行政与社会教化事业……”^[3]金敏甫先生于1929年出版的专著述及当时在外国从事图书馆学术的研究者,指出“在日有:马宗荣(专攻社会教育)”^[4]。可见,此时的马先生虽然在日本学习社会教育专业,却已在中国图书馆界享有较高的名声。

马先生于1930年春回国,“执教上海大夏大学暨南大学”^[3],并被聘为大厦大学图书馆主任^[5]。1932年,大厦图书馆馆舍面积增加,已有独立建筑,图书馆建制由主任制改为馆长制,“聘请马宗荣为馆长”^[5]。鉴于马先生在教育上的造诣,又于1933年在图书馆加设教育研究室,拓展了图书馆的研究与服务范围。1935年,《大夏图书馆报》创刊,“以每月发刊一次为原则,内容以记载新书目录为中心,外附以本图书馆消息,关于图书馆学之论文,及书评等项,藉以促进本馆藏书之活用。”^[6]马先生为该刊的创办付出了很大努力。马先生在主持馆务期间,以图

书馆藏书的活用为本,认为“现今之图书馆行政政策,首当谋馆中藏书之活用”^[6],这是他办馆理念与宗旨的最真实写照。

马先生在从事社会教育的过程中,还编辑出版了大量有关著作。他一回国,就积极参加国内教育事业的社会活动,至迟在1934年8月,已成为中国社会教育社的候补理事^{[7] 359}。抗战爆发后,马先生随大夏大学内迁至贵阳,继续从事教学和管理的工作。1942年,他和谢六逸先生在贵阳创办文通书局编辑所,并出任所长,出版了上百种(一说为400种左右)图书。由于时局动荡,忧国忧民并重病缠身的马宗荣先生,终因积劳成疾,“于1944年1月20日在医学院附属医院病逝”^[2],享年48岁。为纪念他对文通书局编辑所做出的贡献,在谢六逸先生的主持下,特举办了“马所长宗荣先生遗著展览。”

2 撰著图书馆学著作的缘由

马宗荣先生一生出版著作十余种,以社会教育著作作为重,以图书馆著作辅之。从1934年出版的《现代图书馆事务论》所附广告中看到,当时马先生已出版的图书共8种:《西洋教育史纲》、《现代社会教育泛论》、《比较社会教育》、《现代社会教育事业》、《社会教育概论》、《现代图书馆序说》、《现代图书馆经营论》、《现代图书馆事务论》。其中有关社会教育的著作5部,图书馆学著作3部。给人的印象似乎是:在1934年前,马先生在社会教育和图书馆学专业两个方面的研究用力同样深厚。其实,在20世纪20年代后期,马先生已将主要精力放在社会教育方面的研究上了,即使撰著图书馆学著作,也是从社会教育的角度来论述的。又根据中国书网网(<http://www.sinoshu.com>)上录有马宗荣先生所撰著作12种,去除上述5种相同的之外,另有7种:《托儿所经营的理论与实际》(1935)、《大学图书馆经营之实际》(1934)、《古时代的教育》(1940)、《最近中国教育行政四讲》(1938)、《社会教育事业十讲》(1936)、《社会教育纲要》(1937)、《识字运动民众学校经营的理论与实际》(1935)等。在这7种著作中,只有1934年出版的《大学图书馆经营

之实际》是关于大学图书馆内容的,而此时的马宗荣先生,则是大夏大学的图书馆馆长兼教授^[3]。十分明显,该书是马先生在关于现代图书馆经营相对系统的著述基础上,结合自己多年担任大学图书馆馆长的实践,针对当时如何建设大学图书馆方面的论著极少的情况,出于强烈的责任感而出版的。

范并思先生曾明确指出:“马宗荣作为少有的留日学者,似乎游离在图书馆运动之外。马宗荣出版了数部以‘现代’开头的图书馆学著作,未能引起理论界足够注意。”^[8]那么作为社会教育专家的马先生,为什么要撰写系列“现代”图书馆学著作?这一谜团,成为研究马宗荣先生在图书馆界影响的首问。

马先生留日十余年,其间也利用假期回国调研,以供研究之用。例如,1921年的暑假,他就回国调查了江南图书馆的教育现状^[9]。以江南为调研之地,其原因是,相对全国而言,江南的教育发达,图书馆事业发达,具有良好的数据基础。马先生本人直言:“全国中图书馆事业较为发达的地方当推江苏与山西”^{[10] 57},“江苏的无锡县,对于社会教育,甚为注意,故其图书馆事业极为发达。”^{[10] 57-58}且江南交通方便,因而就成为了马先生调研的首选之地。金敏甫先生也深有同感,“自经民国教育部颁布规程而后,渐见繁多,而以江苏为最发达,各县殆皆至少有图书馆一所”^{[11] 63};并用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第1卷第3期的调查数据说明问题,当时全国各省的图书馆数量,江苏145所为最多,直隶77所为第二,两者相差几近半数,可见当时江苏图书馆事业发展确实名列全国各省之先。然而,调查的情况却令马先生吃惊,“就馆数与阅览人数的统计上说,已令人不胜浩叹;再一实地参观其内容,若组织,若设备,若事务处理及教育诸方面,多名存实亡,令人悲观。”^[9]通过与若干馆长的交流,得知并非作为一馆之长不愿改良其图书馆的原有状况,而是缺乏有关兴办、改进图书馆的智识,即使想自修,其参考图书亦难以获得。“继而调查吾国出版论述图书馆之书籍,诚屈指可数,且记载较详明者,坊间已不易收获。”^[9]此时,武昌文华大学图书科成立仅1年略余,还未

有毕业生；1920年8月，北京高等师范学校举办暑期图书馆学讲习会，参加者仅78人；组织人员赴国外留学学习图书馆专业的活动还刚刚起步；有关图书馆专业参考之书，则仅有以日本通俗教育研究会的《图书馆小识》为蓝本撰译的图书等若干种。这就是1921年前后中国图书馆界的现实情况。

这次社会调查对马先生刺激很大。他深感国内图书馆事业的落后，急切盼望着有关图书馆建设的著作出现，以便让人们阅读参考；尤其使图书馆的管理者通过阅读吸收新知，提高对图书馆建设的认识和操作能力，以便整体提高中国图书馆界的管理水平。“但至民国十二年夏，忽焉已及两载，除得见一二极薄极简的小册子外，仍不可得。”^[9]在此情形下，马先生决定撰述有关图书馆学著作。他利用外语优势，利用在日能接触到相关图书馆著作的便利，综合当时的论述，进行思考；更利用自己对当时图书馆的认识、体会，以及所做的调查，撰述了多部有关“现代”图书馆的著作。“当时因取旧有关于论述图书馆之书籍，重为推敲，择评其精华，再加以一己调查所得及理想，纂成《现代图书馆序说》、《现代图书馆经营论》、《现代图书馆事务论》、《现代图书馆教育论》、《现代图书馆发展论》五编，以公之于书。”^[9]

马先生的学术态度是严谨的，他并没有立即出版这5种著作。为了使谬误之处减至最少，并在内容上接受读者的评判，他先在《学艺杂志》上连续发表最具“马氏特色”的论点。因此，“民国十二年（1923）夏编著之书籍，延至十五年（1926）冬始付印刷者，缘此故也。”^[9]在著述过程中，马先生深感中国图书馆界的统计工作在当时做得很少，尽管平时十分注意有关资料的搜集，但只得到两种相关之书作为参考，一部是教育部编的《教育行政纪要》，另一部是北洋法政专门学校编的《全国图书馆调查表》。因此，在他的著作中，有关当时中国图书馆事业的统计数据，大多以这两部文献为依据。关于马先生先在《学艺杂志》上发表的有关论述，金敏甫先生有如下阐述：“而马宗荣氏，译日文之图书馆学书籍而加以己意撰图书馆概论，其首二章

现代图书馆的研究及现代图书馆经营论则已在学艺什杂发表，内容较为完备而有系统。”^[11]³³当时的发表情况是：《现代图书馆的序说》，发表在《学艺》第5卷第9、10期；《现代图书馆经营论》，发表在《学艺》第6卷第4、8期，第7卷第7、8、9、10期^[11]⁹⁰。李小缘先生也介绍过，“要知道建筑的详细可读学艺七卷七八期马宗荣所著之现代图书馆经营论”^[12]。

对于从事社会教育研究的马先生而言，就出版图书馆学著作，起先他的信心也不是很足。因此，在杂志上发表了代表他主要图书馆学思想的文章后，原本并不打算再将著作付印出版。但是，他在比较了当时相关的图书馆著作后，发现他的许多观点与其他著作不同，其着眼点及取材也有许多不同之处，“故卒仍取早稿付刊。”^[9]20世纪30年代，马先生又出版了《现代图书馆事务论》。该著作主要为他担任图书馆学教育之需而出版。1930年春，马先生从日本归国，执教于上海大夏大学暨南大学，“均担任有图书馆管理法课程，乃取旧稿现代图书馆事务论，而稍加整理，以成是篇，而充教本之用。”^[3]序1934年出版的《大学图书馆经营之实际》，则是马先生经过执教大学有关图书馆学课程，以及担任大学图书馆馆长后的图书馆思想汇聚。

由此，尽管马先生所撰“现代图书馆”系列著作5部，但实际出版发行3部，分别由中华书局出版和世界书局出版。

上述是关于马先生撰写并出版有关“现代图书馆”系列著作的因果。那么，马先生为什么如此关注图书馆事业呢？

马先生于1918年考取省官费留日学生而学习矿业，很快因官费途径变更，改为教育部公费资助，并进入日本东京帝国大学从事社会教育研究。当时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是一所高质量的学校，马先生在学习中如饥似渴，钻研精神极佳，深得导师赞赏。其导师吉田熊次教授是一知名的社会教育专家，他的教学与思想，对日本社会教育专业的发展影响很大，同样，也对马先生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日本的社会教育思想，从一开始就将博物馆、图书馆等机构纳入社会教育的范畴，在佐藤

善治郎的著作中,将社会教育的范畴认定为“指学校教育以外的教育事项,包括新闻杂志、神社、宗教、公园、博物馆、图书馆、歌谣及音乐、兴行物、小说、谈话学会、团体。”^{[7] 154}

中国在法令上正式使用“社会教育”一词,始于1912年5月13日。由蔡元培先生向参议院宣布布政见之学说辞中提出,在以后的教育部官制中均设立社会教育司。当时的社会教育主要是取法于日本。1916年11月,由通俗教育会撰写的《调查日本社会教育纪要》(后简称《纪要》)一书出版,“介绍了日本35种社会教育的设施与事业”^{[7] 161},成为当时我国兴办社会教育的准则。在《纪要》中,将图书馆列为第一,认为图书馆是社会教育最重要机关,将通俗图书馆列为第二,以收藏娱乐图书为主旨,将巡回文库列为第三……由此可见,在20世纪初,中国的教育界已十分重视社会教育问题,不仅从教育机构、体制上明确了社会教育的地位与作用,而且在实践中也卓有成效地推进着社会教育的步伐。

20世纪初,日本一直非常重视社会教育的研究,恰恰在这一时期,马宗荣先生正在日本从事着社会教育的学习与研究,他对日本社会教育的历史和研究状况非常熟悉,并深得真传。当时中国近代出现的许多新的文化设施与机构,都成为了社会教育的阵地,包括图书馆、博物馆、展览馆、动植物园、公园、巡回图书馆、电影院、音乐馆、美术馆、通俗教育馆、感化馆、养育院、运动场、游泳池、阅报栏等等。

由于日本一直将图书馆建设作为社会教育的第一要务,更由于图书馆本身作为不分年龄、地位可以免费、公平、自由地开展社会教育的理想场所的功能,马先生从一开始踏入社会教育领域从事学习与研究之时,就十分注重图书馆建设和事业的发展,并搜集有关资料,以备研究之用。这就是为什么他会在1921年利用暑期回国调查江南的图书馆事业,最终形成了富有特色的系列图书馆著作的原因。

3 马宗荣先生主要的图书馆学思想

马宗荣先生的现代图书馆系列著作,主要

取法于美国。尽管他在日本留学历10余年,但他对世界图书馆事业的发展进程深有了解。在著书过程中,他始终以介绍世界领先的图书馆思想、理念、管理等先进知识为己任,同时又广泛吸取各国的长处,除美国外,还包括英、德等许多欧洲国家及日本等国。其系列著作坚持理论联系实际,以理论为指导,以实用为最终目的,“学以致用”,力图使阅读者能够深知图书馆学之奥妙,能够指导阅读者的实际工作。他的系列著作具有“实用大全”之性质,尤其是有关如何创建一个新的图书馆,以及图书馆的管理、业务工作的发展,设备的特点与用处等等,内容十分详细。其图书馆学的核心思想主要有如下三个方面:

3.1 用社会教育思想审视图书馆

马宗荣先生的著作,是将图书馆纳入社会教育的范畴之中考察的,因此,总体上是在社会教育的理论与思维的指导下,对图书馆展开的论述。“图书馆属于社会教育事业的一部分”^{[10] 31}这一论述,体现了当时国际上社会教育思想对图书馆所属的总体认识,无论是欧美,还是日本及我国,只要开展社会教育研究的国家或地区或个人,都已深深地认识到图书馆的社会职能,及其在社会教育中的作用。尤其是日本,始终认为图书馆是开展社会教育活动的最重要的场所之一。马先生立足于社会教育分析图书馆的功能与作用,认为“图书馆具有独立教育机关与补助教育机关的性质,故对于为自修或实习而来馆的阅览者所利用图书的选择上宜严为注意,以尽辅导责任。”^{[3] 19}他进一步从社会教育的角度出发,认识到图书馆具有的独立教育性质。教育有被动与主动的问题,读者为自修或补习而来图书馆,这是一种主动学习之精神与行动;与此相对应,馆员的主动性则体现在图书的选择与推荐上,同时还包括了图书馆的参考功能。马先生十分重视馆员对读者的辅导作用,认为这是开展社会教育的极重要环节。他大力倡导“现世的图书馆,除尽力于其本身的教育外,兼致力于社会教育;如经营讲演会、展览会,办理夏季学校,实施大人教育等。”^{[10] 45}图

书馆的主动、主导作用发挥得越好,其社会教育的程度也就越高。就图书馆的性质而言,有各种不同的图书馆,但是“就社会教育上说,图书馆的效果的著者,当推国民图书馆”^{[10]20},即公共图书馆。因此,从马先生的社会教育观点出发,在他的现代图书馆系列著作中,主要是针对公共图书馆而言的,只是在归国后担任了大学教授和图书馆馆长后,才针对特定的“大学图书馆”而著有一书,但其从社会教育的基点审视图书馆的观点不变。

在中国,将图书馆与社会教育联系起来,提出图书馆的社会功能,并非马宗荣先生为先。杜定友先生自菲律宾留学归国后,曾于1921年8月在广州市民大学召开的特别演讲大会上,进行了《图书馆与市民教育》的讲演,深得听众赞颂。在这次讲演中,杜先生不但传播了美国图书馆知识,还介绍了美国图书馆运动。演讲中他痛陈藏书楼之弊端,并大力鼓吹新式图书馆^[13]。实际上,杜先生在这里已提出了图书馆是一社会教育机构的说法。即使是关于图书馆对提高“社会教育程度”的作用,也不是马先生最先提出的。譬如刘国钧先生就认为:“图书馆既为公开之机关,而人所读之书籍又可影响其思想与行为,则其因读物选择之适当,而提高此社会教育程度、道德标准或培养群众知识,指挥社会趋势亦固其所。”^[14]可见,中国近代图书馆界在20世纪20年代初期,就已经将图书馆作为一个社会教育机构来认识,主要反映的是图书馆的教育功能。因为当时中国图书馆界已开始大力引进欧美,尤其是美国的图书馆思想与精神,而在美国等西方国家,关于图书馆的教育职能,图书馆的社会作用等认识,已经是比较成熟的了。但是,这都是以图书馆为立足点而对其功能与作用所作出的考察,而自觉地站在社会教育的基点上,对图书馆在社会教育中所发挥的作用及其应有的功能作较透彻的考察,则马先生为第一人。在这一意义上,马先生拓宽了我国图书馆事业的视野,开拓了图书馆学研究新的途径。随着对我国图书馆事业史的深入研究,这一点将得到更清晰的反映。

3.2 图书馆是自由利用的教育机关

对图书馆定义的确认,也就确定了一个研究者对图书馆性质的认识。“图书馆,是蒐集可为人群文明的传达者,仲介者,有益的图书,并保管之;使公众由最简单的方法,得自由阅览的教育机关。”^{[10]3}马宗荣先生是我国关于图书馆研究对象中“中介说”的最先提出者,这一点得益于他所学的社会教育专业学科。读者从需求图书到获得图书,其中间就好像隔着一条河,而图书馆就是架在这条河上的桥梁。图书馆中的主体是馆员,馆员积极主动的工作,保证了传达者与中介者的效率。在马先生看来,图书馆的工作目标只有一个,就是对读者提供最简便的自由阅览的方法与途径,这也就成为检验一个图书馆工作开展得好坏,其社会教育功能发挥得如何的唯一标准。因此,图书馆的工作基础是蒐集有益的图书,然后要尽力求得借阅手续的简便,提高图书的利用率。为此,应去除不利于读者阅读的限制,最终的目的,就是全体民众,均可以自由地利用图书馆,“以谋结合读者与书籍为图书馆唯一的理想。”^{[10]42}只有这样,才形成了与社会教育宗旨及目标的一致性,才能真正反映出图书馆是社会教育机构中最重要的机构之特征。为此,他较早地引进了图书馆的“知识喷泉论”。杜威说:“古代的图书馆,譬之如贮水池,是一种死物;现世的图书馆,譬之如喷水,其集书能循环的活用,流动不止。”^{[10]42}这一论述,此后成为20世纪二三十年代图书馆学研究的热门观点,当时许多研究者都用此来加深对图书馆性质的解读,从而使“图书馆是知识的宝藏”的藏书楼理念,提升为“图书馆是知识的喷泉”的现代图书馆新理念。这一理念的提升,极大地推动了中国图书馆事业的发展。为了便利读者阅读,发挥知识喷泉作用,马先生大力提倡图书馆的开架服务制度。他在论著中介绍近代图书馆开架服务“始于美国”,并指出了有关开架制度提议及实行的曲折过程。由于实行开架制的图书馆中图书的利用率明显提高,开架服务迅速普及开来,“1895年费府图书馆成立,开馆之初,即决行全开架式。此举颇给与美国图书馆界一大刺戟。于是不出数年而开

架式的制度风靡全美洲了。”^{[10]38}

开架制解决了读者来馆借阅图书中的自由、便捷问题,对于图书馆学者、管理人员、工作人员而言,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以此为基础,图书馆服务又进一步向满足读者不同的需求而深入开展,尤为突出的是参考阅览室的建设,参考工作的展开,包括巡回图书馆的开展等等,成为图书馆业务中研究和实践的增长点。然而,对于以社会教育为基点来审视图书馆发展的马先生而言,他的关注点着重于图书馆的社会教育功能的发挥。由于社会教育关注的不是部分人的教育,而是全体社会民众的教育问题,因此,马宗荣先生提出了具有超前意义的“未来馆者”的概念。即图书馆解决了来馆读者的阅读问题,这仅是满足了民众中能利用社会教育设施的一部分人员,这部分人,在当时的许多国家还属于少数。那么,如何为没有到馆的那部分读者服务,则是图书馆承担社会教育功能好坏的极重要的指标之一。图书馆要实行阅览机会均等,“不但当仅谋及使得于利用之人——来馆者,当兼谋及使得于易接触之人——未来馆的民众,及管理之人——图书馆中人。”^{[3]21}这些思想,促进了图书馆事业建设的步伐。在此基础上,马先生还提出了图书馆可以进行终身教育的论题,认为图书馆可以使民众获得知识,是为民众提供教育的场所,“使其终身得以继续于小学校获得的智识而深造之,藉以发挥其本能。”^{[10]21}

3.3 提出图书馆的“体用说”

中国近代图书馆界,曾经产生了诸如“要素说”、“矛盾说”、“规律说”、“中介说”、“交流说”等等学说,这是从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出发而产生的各种不同的学说。马宗荣先生站在一个社会教育者的角度去审视图图书馆的功能,进而提出了图书馆的“体用说”。“我们要说图书馆的必要,可以从两方面下笔:一是以图书馆为体的说法,又其一是以图书馆为用的说法。”^{[10]59}

何谓“图书馆为体”,在马先生看来,图书馆是一个可以启发民众智识,可以涵养民众的德性,可以促进文化建设,从而提升民众的素质,

促进社会进步的机构。图书馆中丰富的藏书,上至天文下至地理,古今中外,文理兼容。在书海中,可以远寻前贤思想与知识,坐观异域风物。因而,“自教自学的良机关,真惟图书馆是赖。这是以图书馆为体的说法。”^{[10]59}从中可以看出,图书馆为体,即以图书为体,主要是讲藏书是图书馆的基础,“图书的集团的必要,一即图书馆的必要,”^{[10]59}没有藏书,谈不上图书馆。

何谓“以图书馆为用”?这里的用,并非专指读者对图书的利用,而是更广义的“对图书馆的使用”,是一种从社会教育出发的“用”。马先生指出,当时世界上能够入学接受教育者还是少数,即使教育事业比较发达的日本,能够接受非义务教育者也是少数,“例如日本约有十分的七八未能升学。”^{[10]60}这就阐明了学校教育中的不平等。即使人人都能接受学校教育,那么,从小学到大学,其学业时间也是有限的,因此,学校教育在人的一生中是阶段性的。但是,人的一生是需要不断学习的,而图书馆就是一个可以进行终身教育的场所。因此,“以图书馆为用”的观点,即图书馆是一个可以利用的终身学习的场所的观点。这与以后出现的欲解决“藏与用”的矛盾是不同的。马先生的“体用说”主要解决的是教育的普及、终身接受教育和做好保存文献工作的问题。因为“是则图教化的普及,实为当今的急务;留意文献的保存,亦系虽百世而不可忽的要政。”^{[10]61}

马先生非常注重图书馆藏书的标准。他在介绍美国图书馆的藏书标准时,认为有“客观的方法”和“主观的方法”两种。客观的方法,若以图书馆所在地附近人所用者,可取与人口成1:2-1:5的比例为藏书标准。如果以供管辖区内全体民众所用,最少也宜取与人口成1:10的标准。^{[8]18}这是一种根据人口数量推算的藏书标准方法。而主观的方法,则是根据常年图书馆的维持费而推算的方法,其每年藏书的搜集,主要取决于经费。两者中哪一种方法好呢?“从理想方面说,自应从客观的标准法,然后教化易于普及,图书馆的效率始较为高大。”^{[8]19}

解决了藏书标准后,接下来要解决藏书的内容。马先生认为当时图书馆界的选书倾向大

致可分为两种情况,即“兴趣中心主义”和“理想主义”,前者主张馆内藏书应力求购置民众已知而想要读的图书,这是一种围绕着读者阅读兴趣而展开的藏书建设活动,认为一旦提高了读者的阅读兴趣,图书的利用率自会提高到一个较好的水平,图书馆的社会教育作用也就发挥得出色。“此派人的主张,是图书馆中选择图书宜求应民众所希望;其理论系心理的与实用的。”^{[3]9-10}而后者则主张图书馆中应备民众宜读的典籍。“此派人之主张,是图书馆中选择图书宜求适民众所必需;其理论系于哲学的与理想化的。”^{[3]10}马先生认为两种选书倾向各有利弊,只有两者结合,吸取各自长处,弥补各自之短,才是正确的选书态度与方法,“故稳健的主张,宜合二者而并用之,使能适合于民众的教育程度与心理及客体者与社会能理想化。”^{[3]10}

4 结语

马宗荣先生的图书馆学著述是很有特色的。他从社会教育的角度审视图书馆事业,提出了极富时代性的理论,受到了当时图书馆界的关注,如李小缘、金敏甫等都曾分析介绍过马先生的学术思想。他引进的“藏书楼是知识的贮水池、图书馆是知识的喷泉”之论述,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为许多图书馆学人所瞩目和引用。他所提出的“体用说”的学术思想,也值得人们进一步思考与研究。站在其他学科的基点上来审视图书馆事业的建设,这一点在新的历史时期仍然极具启发意义,并需要人们付出努力。

参考文献:

- [1] 王晓红. 马宗荣先生与图书馆[J]. 贵阳文史, 2007(2): 35-37.
- [2] 何长风. 社会教育学家马宗荣[J]. 贵阳文史,

2003(4): 12-13.

- [3] 马宗荣. 现代图书馆事务论[M]. 上海: 世界书局, 1934.
- [4] 金敏甫. 现代图书馆经营论[M]. 广州: 广州图书馆协会, 1929: 51.
- [5] 本大学图书馆概况. 大夏图书馆报//本社编. 近代著名图书馆馆刊荟萃续编[M]. 北京: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2005: 561-562.
- [6] 马宗荣. 创刊之辞. 大夏图书馆报//本大学图书馆概况. 大夏图书馆报//本社编(近代著名图书馆馆刊荟萃续编. 北京: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2005: 533.
- [7] 王雷. 中国近代社会教育史[M]. 北京: 人民教育出版社, 2003.
- [8] 马宗荣. 现代图书馆研究//中国图书馆学会, 《建筑创作》杂志社. 百年文萃: 空谷余音[M]. 北京: 中国城市出版社, 2005: 编者引言.
- [9] 马宗荣. 现代图书馆经营论[M]. 上海: 中华学艺社, 1928: 序.
- [10] 马宗荣. 现代图书馆序说[M]. 上海: 中华学艺社, 1928.
- [11] 金敏甫. 现代图书馆概况[M]. 广州: 广州图书馆协会, 1929.
- [12] 李小缘. 图书馆学(1927)//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 李小缘纪念文集[M]. 南京: 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 2007: 170.
- [13] 王子舟. 杜定友和中国图书馆学[M]. 北京: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2002: 21-22.
- [14] 刘国钧. 近代图书馆之性质及功用//史永元, 张树华. 刘国钧图书馆学论文选集[M]. 北京: 书目文献出版社, 1981: 1-3.

吴稼年 江南大学图书馆研究馆员。通讯地址: 江苏无锡蠡湖大道1800号。邮编214122。

(收稿日期: 2008-09-09)